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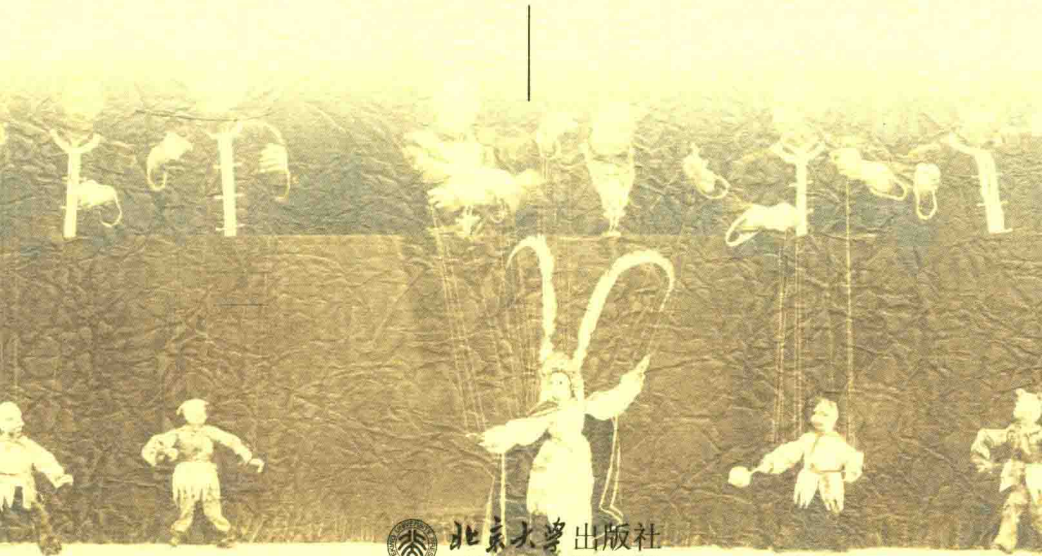
Ga Le's Memory

The Study of Heritage Identity of
Quanzhou Marionette Show

加礼的记忆

泉州提线木偶戏的遗产认同研究

魏爱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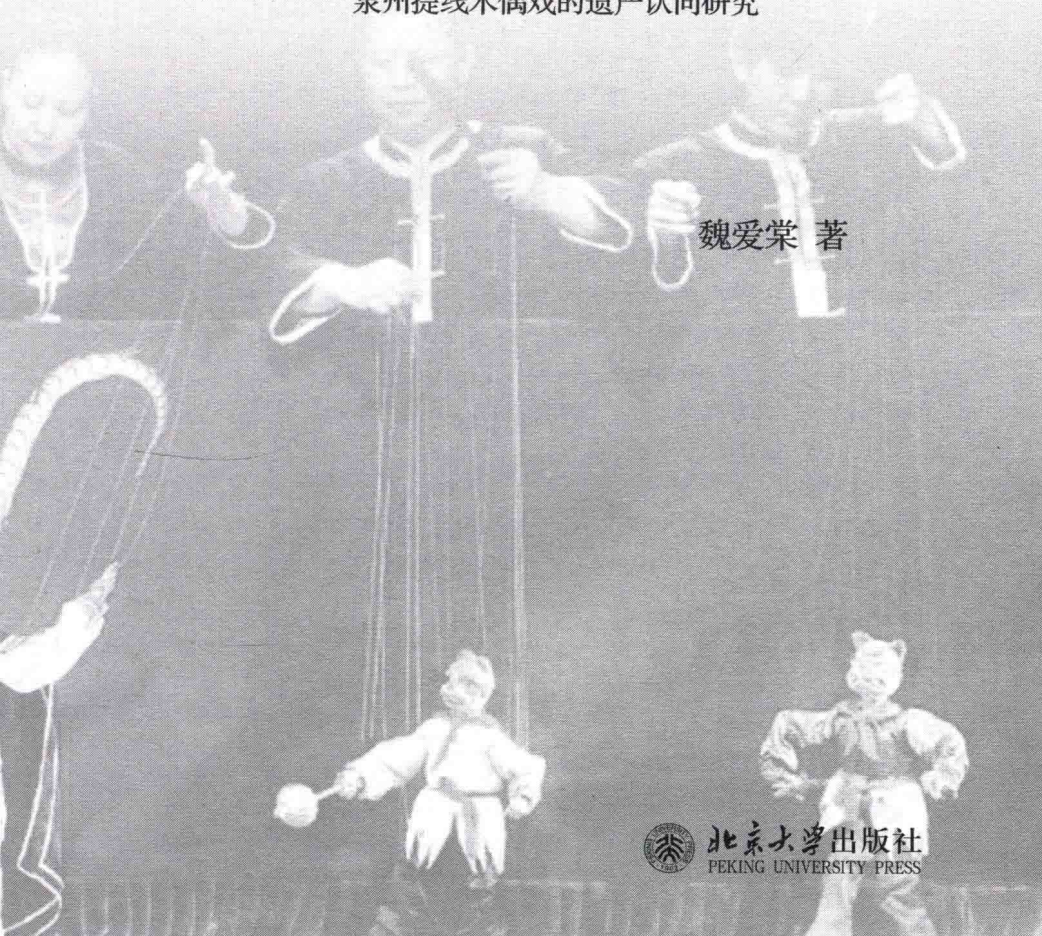
Ga Le's Memory

The Study of Heritage Identity of Quanzhou Marionette Show

加礼的记忆

泉州提线木偶戏的遗产认同研究

魏爱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礼的记忆:泉州提线木偶戏的遗产认同研究/魏爱棠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ISBN 978 -7 -301 -25863 -7

I. ①加… II. ①魏… III. ①提线木偶戏—研究—泉州市 IV. ①J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9075 号

书 名 加礼的记忆:泉州提线木偶戏的遗产认同研究

著作责任者 魏爱棠 著

责任编辑 陈相宜

标准书号 ISBN 978 -7 -301 -25863 -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2.75 印张 327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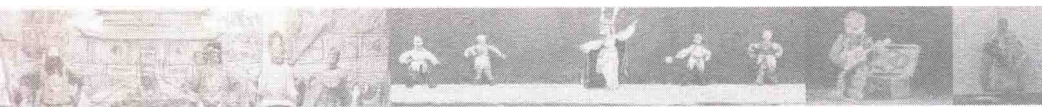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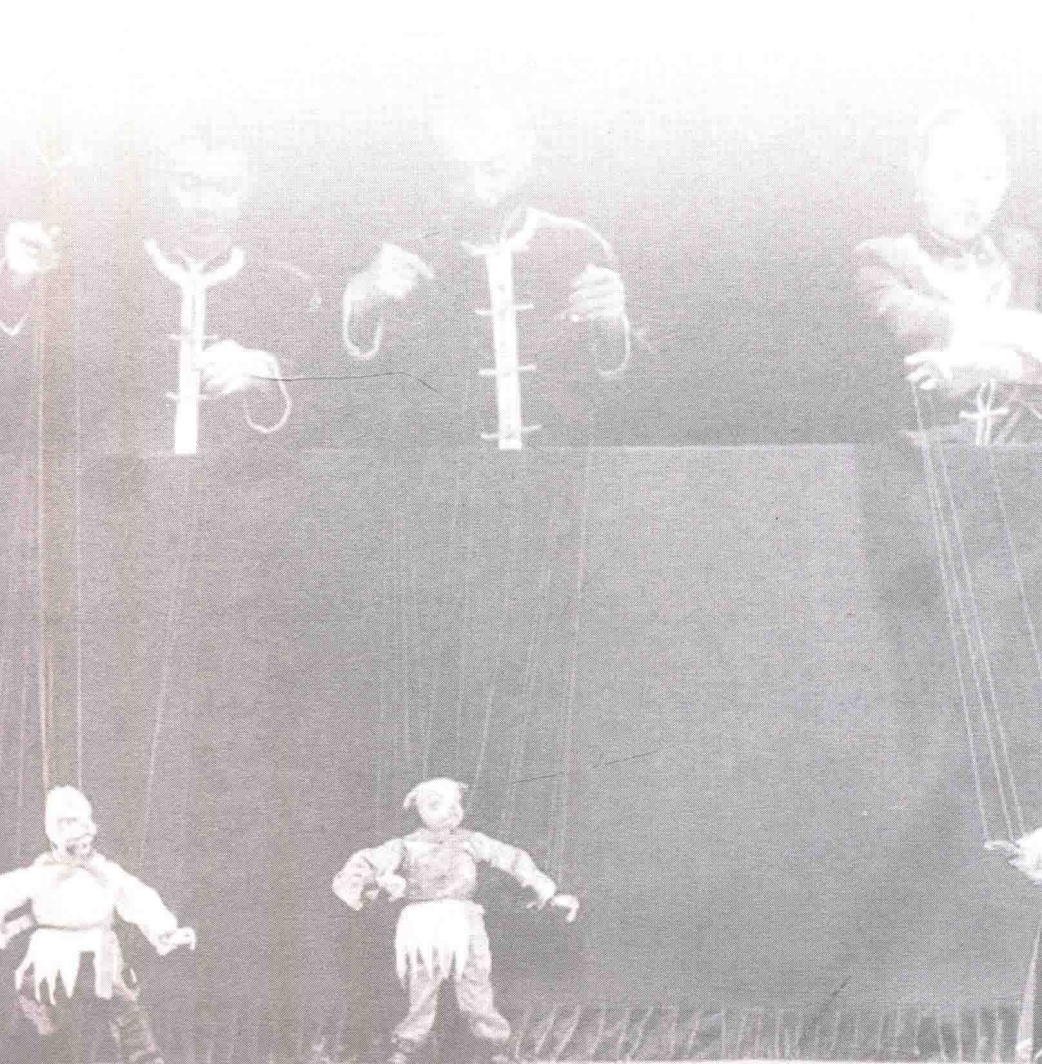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计划”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9BMZ021）成果



田野归去来

(丛书总序)

彭兆荣

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商标”。以今天的眼光看,没有田野,便没有人类学这一学科。人类学对这一商标的确认曾经历过一个历史性认知过程,无论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所开创的田野范式是否构成对“太师椅式”问学方式的“范式转型”,人类学界对于这些学理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充分,此处不予赘述。

“田野”首先是一个异乡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完整实体,民族志者只有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由母体养育所形成的文化惯习场域,才谈得上对“异文化”的观察、认识和研究。“归去来”不啻为形象描述;它已非陶公《归去来兮辞》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独善其身式的隐居,而是人类学学科的公共规约。

“田野归去来”表现为一个身体践行的组合行为,其目的和目标具体而切实,它不是乡村旅游,也不是生态旅游,而是人类学者通过最为简单的“归去来”方式,一方面参与观察对象的文化全景,另一方面“朝圣”般地奉行学科旨意,“炼狱”般地进行身体考验和心灵拷问,最终通过“主位—客位”的双重考试。

田野作业同时也是民族志所通行的“质性研究”的简编版本。费孝通先生以“解剖麻雀”予以概括,生动而贴切。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长时间深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小社会、小族群，本质上与研究复杂社会、复杂人群有共通之处，仿佛细胞之于身体机能。

人类学“小社会”的实地研究决定了其“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异常和非常，在平凡中体会不凡和非凡”的特点，这使得人类学者不仅能体验到“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感”，习得田野作业的技巧和技能，获得对“异文化”的认知，也体现了人类学整体研究的旨意。因此，“现场”成为一个关键词，它是“田野”的根据地。

“现场”表现为特殊的结构场域，包含历史、传统、文化、生态、民俗等“历时—共时”全景，是特殊人群、族群生活的场所；遂为民族志者最基本的“工作作坊”。甚至人类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现场”性历史和文化叙事的建构工作。所以，“我者的现场”与“他者的现场”语义叠加，色泽交映。

于是，“实证”便成为一个有限性概念，它关乎用“客观”的手段和技术寻找所谓的“原真性”。而二者皆由人完成。天下之事皆为“事实”，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主体是人，因此对“事实”作判断必然言人人殊。对于任何人文学科来说，“实证”的最大公约数是学者们对“真实性”判断所呈现的启示录。

借此又将当今民族志范式的转型和实验民族志带回到民族志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原生性层面，也带出了“实证”之重在于获取可资验证的“事实”，还是“事实之后”的阐释诸热话题；逻辑性的，人作为实证工作的主体和介体，即“身体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研究视域。“每个人都是典型”，是谓也。

回眸“本土”实景，人类学“舶来”中国已近百年，中国的人类学者一直在这一学科的历史“引渡”中苦苦求索“中国化”的生长机理。然而，这一外来“物种”在中国“百年孤独”的际遇，致使其直至今日仍给人以在“西装”和“长衫”的组合中未及“美美与共”之境，尽管其中不乏偶尔精彩的亮相。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需重“三线组合工程”，即人类学知识谱系与国际人类学同步伸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特色之机理和

进行扎实的田野个案研究。人类学界有“大/小人类学(家)”之说,“大”者,侧重建构“文化语法”,“小”者专事民族志的精致案例。彼“大/小”非此“大/小”,没有高下分类。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的研究要注重全球化视野中地方、族群与民族国家互动所生成的新的文化质丛(英文为 cultural complex,意思是文化元素的集结和组合)、新的文化样态以及跨文化对话与理解。毕竟,传统“不变的社区”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越来越难以存续。如何在多维视角中保持民族志范式和法典,各种实证、实验和实践已属必然态势。

本丛书即是“田野归去来”的果实,呈现出人类学研究在面对当代社会文化事象时所激发出新的阐释力、理解力和方法论。全面贯彻以上“三实”(实证、实验、实践)的原则,既遵循传统民族志范式的基本义理,又兼顾现代快速变迁的社会所生成的新景观,以中国的文化“语法”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工作。

本丛书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人类学与乡土仪式”“人类学物质研究”以及“人类学、遗产与旅游”,从三个研究视域出发,管窥人类学特色,展示国内一批年轻学者立足人类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最新努力,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本丛书所有作品的作者都是本人近十年来带出来的博士(博士后),但我不敢“专美”,因为那都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作品以实证为据探讨人类学学理、学问和学术。丛书部分体现了本人的学科理念、学术专长和教学风格,更是作者们个性化的呈现。其中有些弟子受到过人类学大师的指点。他们是正在成长的一代。

任何实验和实践都包含摸索的意义,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启发;这些启发可以在人类学学科之内,也可以在诸学科交叉领域,还会对那些未入行的蓄势待发者产生影响;这种启发包含着激发新一辈对“小地方,大事务”乡土社会的关注,并产生对人类学图景的憧憬和“入行”的热情。



任何事业都是代际性的，因此，顺利的代际交接是保证一个学科事业永续发展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对这一代“导师”教学效果的测试，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在特定、特殊历史时期发展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教学之于特定时期教育体制的历史反映。我们没有理由和能力超越历史。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她多元、多样、多彩，成形于“多元一体”的自在与自觉；成就于“自我的他性”的实在与实体。“田野归去来丛书”正是对这一集中国知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一体的探索和思考、实验和实践的集体献演。让我们为之喝彩吧！

2012年五四青年节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前 言

泉州提线木偶戏,俗称“加礼”,亦称“嘉礼”或“傀儡戏”,是流行于中国闽南、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的一种地方戏曲文化遗产,也是泉州地方仪式生活重要的文化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泉州提线木偶戏与其他地方戏曲艺术一起被国家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了其作为国家遗产的历程。2006年,泉州提线木偶戏再次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泉州提线木偶戏进入了第二次成为国家遗产的过程。

本书关注遗产的表述,围绕半个多世纪以来泉州提线木偶戏成为国家遗产的过程中所展开的一系列表述权力争夺,来探讨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与遗产持有者群体认同的变迁过程。过去我们探讨遗产保护问题很少关注到:遗产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遗存,也是一个承载了时代的、政治的、权力的多重价值的社会再生产的产品。当某一特定族群的遗产被选定为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时,族群或地缘性的历史记忆就不再是其遗产表述的唯一主题,遗产所属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已经深深地镌刻在遗产的记忆中,构成了遗产表述不可磨灭的印痕,也使遗产在保护的过程中呈现出各种复杂的关系图景。本研究借助于历史记忆的理论框架,以泉州提线木偶戏从第一次成为国家遗产到第二次成为国家遗产的转变过程为切入点,重点探讨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是



谁在表述这个遗产记忆？为何他们如此表述这个遗产记忆？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包含的认同网络结构如何？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所包含的认同网络关系是如何发生的？泉州提线木偶戏成为国家遗产的过程与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它对我们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在哪里？

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遗产化过程之后，泉州地方的“加礼戏”变身为“提线木偶戏”，成了一种具有地方性的国家遗产。在这个成为国家遗产的过程中，泉州加礼戏作为一种地方性仪式象征符号的历史记忆被彻底地“遗忘”了。“神明”逐渐退出了加礼戏的遗产记忆，“人”成了泉州提线木偶戏演出的唯一焦点。泉州提线木偶戏逐渐从地方性的说唱表演与仪式象征符号转变为以形象动作表演为主的现代剧场艺术和国家的文化象征。传统的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在侨乡独特的文化传统结构中静静地等待着重新发现与复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侨乡经济的发展与地方资源的聚集，活跃于地方仪式情境的民俗性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被重构出来。尽管民俗性遗产记忆是传统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一种重构，但是，随着老一辈加礼艺人接连逝去，民俗性遗产记忆与剧场化遗产记忆一样，越来越反映出当下环境的背景特征，构成了当代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的一体两面。

与此同时，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持有者群体的认同结构逐渐发生裂变，遗产意义的解释日益分化，联结遗产主体不同部分的记忆纽带日趋松弛，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存续危机。一方面，专业剧团逐渐跨越了传统泉州戏曲关系的认同边界，重建了“正班”与“土班”的认同区分，传统“大班”“中班”“小班”之间的柔性界限逐渐凝固，改变了这一遗产持有者群体内部原有的流动本质，降低了遗产持有者群体内部相互激发创造的传承生命力。另一方面，遗产认同之“现在”与“过去”的决裂，造成了遗产持有者群体代与代之间的隔阂与区分，进一步瓦解了遗产持有者认同网络的整体性，也造成了遗产越来越脱离其地方性的知识系统与文化结构，丧失

了其在地方传承的社会基础,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的传承面临着断裂的危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动,为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持有者群体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民俗性遗产记忆表述的边缘性地位并没有因此改变。现代的、剧场化的遗产记忆成了泉州提线木偶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唯一合法的表述,民间的提线木偶戏遗产持有者依然被排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益范围之外,民俗性的遗产记忆表述仍旧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所遗忘。

从深层次上说,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与认同网络的结构变迁,其实反映了遗产持有者群体在特定的遗产表述权力关系背景中对其历史记忆的表述选择。泉州提线木偶戏第一次成为一种国家遗产,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新政权通过建构新的国家遗产体系以建立新政权合法性的背景之下,是发生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者致力于以启蒙的历史观来创造一个不断向现代演进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结构的过程中。新中国采取了一种与过去决裂以获得重生的方式,来再造新的国民认同。泉州提线木偶戏被认定为国家遗产,正是国家以民族文化遗产的形式来实现对戏曲艺术作为民间宗教信仰文化遗产的历史终结,是国家以民族国家的叙述结构来重构传统文化资源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的行动策略。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现代性意识形态背景控制了中国国家遗产体系的话语实践,使中国国家遗产的实践变成了以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来取代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传统历史记忆的大量丧失,遗产的文化意义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生转移和转换。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恰恰反映了东西方在遗产概念实践上的冲突与妥协,提供了一个反思和重构中国国家遗产体系的机会。然而,在缺乏对中国既有国家遗产体系概念反思的前提下所开展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依然充斥着现代性追求的惯性冲动。

因此,本书提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其一,遗产认同不是一个完



全由原生性情感纽带或文化特征维系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外在情境决定的记忆重构过程。遗产认同本质上就是一组相对位置的暂时性关系,从来没有一个所谓本原的、一成不变的遗产“真实性”。遗产的“真实性”表述就是一个在当下社会历史情境中,地方族群与超地方遗产主体之间相互竞争与协商各自遗产记忆的动态过程。现代遗产的实践过程其实是一个超地方遗产主体不断增强其对地方族群和遗产持有者等遗产原生主体影响的过程。保护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包括遗产持有者和地方族群在内的遗产原生主体与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超地方主体争夺和协商遗产表述权力的过程。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倡导对国家遗产体系建立过程的意识形态反思,需要超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遗留物”的认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当地族群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本质,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群体和地方社区作为最重要保护主体的认识。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主体,应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助于差异性遗产记忆和解与合作的对话平台,扮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群体和地方社区的文化赋权者和促进者的角色,支持遗产持有者群体和地方社区自己传承自己的文化。

其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重视以“记忆社区”作为基本操作概念。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困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集体记忆断裂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作为集体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如何传承的,以及如何去修复和弥合已经存在的集体记忆断裂的问题,而不是把个体记忆的传承作为我们遗产保护的核心。“记忆社区”代表了一个汇聚了丰富互动记忆的群体关系网络。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历过国家遗产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务之急是要从历史记忆层面上去修复和弥合“记忆社区”的认同断裂,重建遗产持有者群体的互动网络。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 1

第一节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 / 2

第二节 作为历史记忆的遗产认同：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 14

第三节 木偶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29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本书架构 / 42

第二章 泉州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 / 53

第一节 泉州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生态 / 53

第二节 泉州社会的历史与文化 / 59

第三章 泉州木偶戏遗产主体的原生认同 / 73

第一节 遗产命名背后的记忆与遗忘 / 73

第二节 遗产“记忆社区”的解体与重构 / 91

第三节 遗产政治过程中的结构与情感 / 112

第四章 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认同的重生与转换 / 130

第一节 家园遗产的根基性纽带 / 131

第二节 民族国家情境中重生的木偶戏遗产 / 166



第五章 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认同的延续与保持 / 193

第一节 记忆的传承与遗产认同的养成 / 194

第二节 记忆的权力与“原生态”遗产保护 / 218

结 论 / 242

参考文献 / 281

附 录 / 301

附录一：泉州部分世家传承的民间提线木偶剧团简介、谱系与
剧目传承 / 301

附录二：泉州南安官桥提线木偶剧团 2001—2010 年演出记录
统计 / 313

附录三：泉州晋江声艺提线木偶剧团 2006—2012 年演出记录
统计 / 316

附录四：1952 年《闽南戏曲调查资料》之《傀儡戏(线戏)》 / 318

附录五：泉州市人民文化馆编《泉州的木偶戏》(时间可能在
1952—1953 年间) / 325

附录六：1956 年泉州木偶实验剧团资料室编《闽南傀儡戏介绍》
/ 329

附录七：原晋江提线木偶剧团《相公簿》 / 331

附录八：部分泉州提线木偶戏图片 / 338

后 记 / 349

第一章 导论

近年来,“遗产”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热点。伴随着一波波的“遗产”申报行动,“世界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陌生又拗口的名词开始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政府直接推动的遗产保护工程,更为学界的遗产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地。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也从 20 世纪乏人问津的“冷点”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从中国知网的检索可以清楚地看到,2000 年以前,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不过 300 余篇,而 2001—2011 年这十年间相关主题论文增长了 20 倍。

反观遗产保护的实务领域,这十年也可谓是硕果纷呈。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昆曲入选。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次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后颁布了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古琴艺术入选。2004 年,我国文化部、财政部正式推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三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同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生效,同年,中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中国政府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以及第一、第二批传承人名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五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南音等2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至2011年,我国已有29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7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节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

从上述一系列的实务行动中清晰可见,在这十年中,中国的“遗产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政府分别是国际与国内两种重要的推力,它们的交互作用带动了地方、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共同投入和参与建构中国的“遗产热”。因此,不能不说,中国当前的“遗产热”是发生在国际遗产运动的语境之中的,这一语境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建构过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遗产运动作为一种国家公共资源政治的表述

然而,溯及国际遗产运动的渊源,却并不是这短短十年历史可以写尽的。现代意义上的“遗产”的观念,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血与火将原本属于国王、教会和逃亡贵族私人财产的艺术品转变为公共收藏,从而建立起了公共博物馆。^①可以说,现代公共博物馆从诞生之初就依循把原属个人或家庭、家族的“遗产”转变为公共资源的发展路径。原初作为“父辈传下的财富”的“遗产”开始被重新表述为“国家的遗产”,表明从此之后代表国家的政府成了保护艺术和建筑杰作的首要主体。“国家遗产”的概念从此成了现代遗

^① 李军:《什么是文化遗产——对一个当代观念的知识考古》,陶立璠、樱井龙彦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产保护实践的核心理念。^①时至今日,“遗产”是一种表述,这已是国际遗产研究的共识。^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博物馆、遗产中心和国家公园迅速发展起来。表面上看,它是一种经历战争浩劫和现代化大规模城市建设破坏后文化自觉的结果。然而,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实际上,二战后几十年的遗产努力都是致力于拯救地主贵族和上层阶级的遗产,那些被纳入遗产名单的往往是有钱人收藏的名贵艺术品和他们的大庄园。^③ 尽管不断延烧的“收藏热”使收藏品的名单从名贵艺术品逐渐扩展至照片甚至是明信片,然而,那些传统的弱势群体并没有因此受益。他们被迫从那些他们无力维修的旧茅屋搬出,而这些茅屋在经过富有的新主人的重新维修后却成了值得收藏的“遗产”。当茅屋被赋予“遗产”价值时,贫穷的旧主人却被排斥在了“遗产”所有者之外。因此,“遗产工业”被认为是政府与富有阶层的一种“共谋”,以劝服人民大众为少数人的娱乐买单。^④

遗产的动机理论则揭示了蕴藏在“国家遗产”背后的政治合法性

① 除了李军之外,李春霞在《遗产源起与规则》一书里也系统地梳理了“国家遗产”概念的源起与意义。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形成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遗产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国家遗产”的概念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指的是官方承担保护艺术和建筑杰作责任,它最终奠定了今天世界遗产运动的理念基础。“国家遗产”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历史,这也使得它成为国际遗产理论研究重要的关注焦点,目前主要的遗产理论都建立于对“国家遗产”概念探讨的基础之上。

② 遗产不仅作为实物形态(包括特殊的“非物”形态)来说明它代表什么、表达什么和包含什么。实际上,遗产的意义表述还会受到遗产相关和所属的社会、历史、时代、族群、地缘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现代背景中,由于阶级、阶层、民族主义、商业利益等因素的卷入,遗产往往还会被赋予大量的附加性、再生性和延伸性的意义,从而使遗产在保护过程中呈现出各种复杂的关系图景。因此,遗产的表述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遗产研究最为关注的内容。

③ R. Hewison,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in P. Howard, e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2), p. 37.

④ R. Samuel, “Theatres of Memory: Volume 1.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in P. Howard, e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2), p. 38.